附件2：

党史中的廉洁故事（节选）

**1.主席去作报告**

1940年延安，初秋的空气有些清冽，毛泽东应邀为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作形势报告。当天早晨，负责二级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、副院长范文澜叮嘱韩世福、邓力群、安平生、马洪四位同志：“提前吃饭，今天请毛主席来二级学院作报告，由你们接送。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。”

当年延安的条件异常艰苦，设在兰家坪的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，其校舍就是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，教学设备也很简陋。“怎么去接毛主席？”韩世福等四人犯了难。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，便说：“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不要紧，去吧。你们早点去，如有变化，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。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。”

那时的延安，从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小道，三四公里的路程，中间隔着延河。韩世福等四人来到延河边，走到用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时，与毛泽东相遇了。

毛泽东开口就问：“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，要干什么去呀？”

邓力群答：“二级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。”

“接我？嗯，我晓得的，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。你们放心好了，二级学院给我的任务，那是忘不了的。”毛泽东笑了笑。

邓力群解释道：“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，我们来晚了，很不像话。”

毛泽东摇了摇手说：“这样做有点不好，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来接，要不得！要不得！”接着，毛泽东环顾四周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哦，四个人，轿子呢？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？下回呀，跟你们领导说，再加四个人，来个八抬大轿，又体面，又威风。要是还有人，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，派几个摇旗呐喊的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

韩世福、邓力群、安平生、马洪都笑了，毛泽东看着他们也笑了：“那才不像话嘛，对不对？皇帝出朝，要乘龙车凤辇。官僚出阁，要坐八抬大轿，前簇后拥，浩浩荡荡，摆威风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是讲革命的，要革皇帝官僚的命，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我们既要革命，又要和旧的制度决裂，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。从杨家岭到马列二级学院，十里八里路，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，这几步算不了什么。我又不是不知道路，不要接接送送。”就这样，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走到了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，为师生作了报告。报告会结束后，毛泽东又独自步行回杨家岭。

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

从杨家岭到兰家坪，毛泽东走这条路时，何尝不是带着对权力和职位的清醒认识在走，何尝不是用求真务实的新风正气在走。

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北，到1948年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，13年间，党中央在延安的黄土地上书写着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情怀，凝聚着人民至上的伟大力量，讲述着清正廉洁的革命风范。
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中国共产党穿越风雨、踏平坎坷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，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。这条道路、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。因为，“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，不是当官做老爷，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，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、共患难、心连心的。”

**2.总理拒进家门**

1960年的一天，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对秘书发起了火。

这位秘书叫何谦，平日里主要负责总理的生活和保卫。而让总理发脾气的原因，正是何谦未经总理允许，擅自修缮了总理的住所——西花厅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。这个长方形的四进庭院建于清朝末年，曾是溥仪父亲居住的花厅。

陈旧、阴暗、潮湿，夏天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，屋内木头也有些腐朽了，梁柱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，这就是总理的住所。如果说老旧尚且可以忍受，潮湿却是十分麻烦。在西花厅居住期间，周恩来腿疼的毛病经常犯。时间久了，秘书何谦也看得十分心疼，屡次劝总理将西花厅适当修缮一番，但都被回绝了。

看到总理态度如此坚决，何谦悄悄打起了自己的“小算盘”。1960年初，周恩来赴广东出差两个月，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，何谦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，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。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木地板、封严漏风的窗户、更换发霉的旧地毯及旧灯具、将已经破了的白布窗帘换成较厚的呢子窗帘……何谦抓紧时间修缮，同时也考虑到总理平日勤俭节约的作风，尽量减少开支。西花厅装修完毕，何谦还暗想，这样应该能符合总理的要求。

谁知周恩来视察归来，还没踏进屋门，就发现了这些变化，于是便有了大发雷霆的一幕。

何谦连忙检讨：“总理，是我错了……您先进屋休息吧……”

周恩来气愤地反问：“我回屋，接受你的既成事实？”随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说：“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，否则我不进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见此情形，其他人忙追上去劝总理，只听他大声说：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！”

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、灯具、窗帘等能够挪动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已经修缮好的地板、窗户，再换的话，又是一笔费用。周恩来只好让秘书算账，换过的东西他要个人付款，绝不用国家的钱。他说：“国家现在这么困难，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，怎么能用公款为我家里装修，这是不能允许、不能容忍的。”

等西花厅恢复了旧貌，周恩来才进了家门。事后，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多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检讨自己，并教导秘书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要影响一大片。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……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
“廉洁奉公，以正治国者，周总理也。”这是陈毅对周恩来的称赞。

1974年6月1日，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住进医院，直到去世，再没有回到过这里。

“解放初期，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，就爱上了海棠花，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，选定这个院落，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，整整居住了26年。”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。古朴简陋的西花厅，既是周恩来的“小家”，也见证了这位国家总理无数为“大家”忙碌操劳的身影，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、克己奉公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。

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。

转眼百年，是这信仰，让那艘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，乘着历史的汹涌波涛，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擎天巨轮。从曾经的贫穷落后到如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见贤思齐，中国共产党人将汲取老一辈革命家的不竭精神力量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引领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，在新时代铸就新的辉煌。

**3.总司令的两封信**

1937年初冬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，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“借款信”。

朱总司令竟然也需要借款？

原来，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。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朱德心里虽急，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。

这时，他想到了在四川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，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。但这笔钱，总司令却明确表示，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。

“我十数年实无一钱，即将来亦如是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，速寄家中朱理书收。此款我亦不能还你，请作捐助吧。”

戴与龄小朱德两岁，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，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。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，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，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。

接信后，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，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。

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“十数年实无一钱”，着实令人震惊。而从下面这封他于同年9月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来看，却又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
“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，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。”朱德在信中托陈玉珍对家中小辈提出了这个“不近人情”的要求。

他还解释道，“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，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，任何闲散人来，公家及我均难招待。革命办法非此不可。”

坚守“革命良规”、身无分文的朱德就这样“狠心”拒绝了亲族的投奔。他决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儿私利。

1941年春天，朱德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视察，看到院子里挂着战士们猎来的豹子皮，走过去摸了摸，连说：“好皮子！好皮子！”教导队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总司令铺的、盖的都很单薄，几个干部一商量，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。

当天下午朱德要离开时，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拿到朱德面前。

“你们这是做啥子嘛？给我进啥子‘贡’呦？我们党是有规矩的，不兴送礼这一套，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！”

随后，他指着教导队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很辛苦，穿得却那样破旧。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，能做好多套衣服，让我白拿豹子皮，那我不成了‘剥削户’了？总司令‘剥削’大家，这多难听。”

正是对“革命良规”的坚守，朱总司令一生戎马、两袖清风，无愧于一个“德”字。

如今，战争的硝烟散去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火中锤炼的廉洁作风却一直警醒着我们：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，只有坚守“良规”，才能无愧人民。

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两封信，并说道：“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、清廉如此，让人肃然起敬！”

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再一次重温朱总司令的这两封信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优良作风令人肃然起敬。

**4.刘少奇严待子女**

“不要打着我的名义，干个人的事情。”这是刘少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，都知道他有许多的不准、不许。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刘少奇一直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洁，从不搞特殊，这一点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在刘少奇子女们的记忆里，家里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向来没有什么不同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，国家粮食紧张，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，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，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。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当时正在寄宿制学校读书，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样，只能依靠很少的定量粮食生活，偶尔回家吃饭，家里的饭菜也是一样简单朴素。由于长期吃不饱饭，孩子们日渐消瘦。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，便私下询问他能否偶尔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，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。他对几个孩子说：“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受苦，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。”

除此之外，刘少奇的家也是相当简朴。一次，孩子们的老师来家访，发现刘少奇的居所陈设简单，非常惊讶地感叹道：“没想到主席的孩子居住环境竟是这样简朴，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。”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后，刘少奇和蔼地对老师说：“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管教，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，就迁就他们，那样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刘少奇严于律己，更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。他的大女儿刘爱琴曾在《我的父亲刘少奇》一书中写道，“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，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。殊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，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。”

1951年2月，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爱琴党员预备期满。一般情况下，党员预备期内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可以转正。然而刘少奇在得知此事后，却提出反对意见。他专门给学校写信，认为刘爱琴并未达到党员标准，不应该批准其转正。“不管什么人入党，都要坚持党员标准，严格要求。”他在信中说，对自己的女儿更应该严格要求。最终，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刘爱琴转正。这件事对刘爱琴的打击很大，在她的心里，自己出身好，从小吃苦，经过艰苦环境磨炼，转正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却没想到父亲这样不近人情。一时间，刘爱琴甚至有些埋怨父亲。然而等她冷静下来，认真反思自己，回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教育，在父亲近乎无情的严厉中，她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关爱。1958年，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干部下放边疆的号召，去内蒙古工作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终于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“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。” 刘少奇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一直坚持要求家人积极参加劳动。在中南海居住时，除了日常的家务，他还让家人种植果树，甚至修建房屋时让妻子王光美带领孩子们去工地参加劳动。1958年，刘少奇觉得孩子们长大了，只在自家院子里劳动还不够，便要求孩子们暑假时半天时间复习功课，半天时间去公社同农民一起劳动，并且要像农民一样“不怕热，不怕累，不怕吃苦”。殷殷教诲言犹在耳。

一句句严厉的话语，彰显的不只是刘少奇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份苦心，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。